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2003731@tom.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成仿吾与中共中央党校

□陈 明

1984年5月17日，成仿吾在北京病逝，至今已整整30年。

成仿吾博学多才，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是万里长征中唯一的教授，曾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成仿吾一生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尽心竭力，为党的教育事业忠诚奉献，他与中央党校有着不解之缘，远到1934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专职教员，近到1984年病逝前担任的中共中央党校顾问。

唯一的教员

1934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分管教育。4月，成仿吾到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前身）工作，代替潘汉年负责高级班的教学。当时主要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传达和讲解党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文件。当时学校共有新苏区工作人员班、中级班和高级班三个班。成仿吾等除了教学外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达到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氛围的目的，张闻天、刘少奇、博古等都来讲过专题报告。之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中央领导人时间少了，成仿吾成了当时中央苏区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唯一的教员。战火中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学员没有课本，学习全凭听记和讨论。成仿吾想出一些新方法加深学员的理解。比如在讲社会发展史时，他把有关图书、资料中的插图找出来，自己绘图并编排，用形象的画面说明人类进化过程，并进行展览，以达到教学效果。

战火中实践

1934年10月，成仿吾随中央红军长征，继续担任政治教员，在行军的途中还抓紧时间上课。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陕北瓦窑堡不久，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正式定名“中共中央党校”。当时中央党校仍只有三个班。成仿吾是教务主任、高级班的班主任和政治常识课教员。另两个班的班主任是习仲勋和冯雪峰。1936年初，红军抗日先锋军宣告“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成仿吾和冯雪峰率领中央党校学员随军东征，做群众宣传工作。成仿吾率学员随军在水头、双池、川口一带宣传抗日救国，组织群众打土豪。4月，成仿吾接到党中央电报速返，他在兴县渡黄河提前返校。不久，党校师生胜利返校。这次东征大大促进了学员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

1936年6月，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中央党校随中央迁到保安任家坪村。当时党校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据成仿吾回忆：“学员共分七、八个班，集中上课比较困难，我们就采取‘小先生制’，把班主任们集中起来，先给他们讲；他们作详细记录，然后再回去给学员讲。”

党校在任家坪村时，根据中央的决定，原四方面军的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仿吾奉命亲自到甘肃接原四方面军党校学员到保安。途中，有的学员病了或走不动了，成仿吾就把自己的马给学员骑，自己走路，与大家同吃同住。从四方面军党校来的学员曾深受张国焘路线的迫害，成仿吾非常理解和同情这批学员，生活上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还和学员交谈观点，排解苦闷。

不久，中央党校又从保安迁到定边，再到延安。迁到延安后，党校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仿吾仍任教务主任，他除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外，还讲授马列主义、历史、地理等课程，甚至还为文化基础差的学员补习基础课，亲自批改作业，学员深受感动。1937年7月，党中央调成仿吾到新创立的陕北公学任校长，他离开了党校的岗位。

再续党校缘

成仿吾离开党校岗位后，历任了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大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人民大学副校长、东北师大校长、山东大学校长等诸多重要教育岗位。


长征途中的成仿吾

1974年的7月，成仿吾写信给毛泽东，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问题，指出诸译本中错误很多，表示自己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毛泽东看到信后，很快作了批示，支持成仿吾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校译工作。并指示：调成仿吾来京，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位置，配几个助手，让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工作。

成仿吾与中央党校注定有着不解的缘分，可以称得上是与红色教育结下半世情缘。离开党校37年后，1974年的12月，成仿吾到中共中央党校任顾问，迁到了党校院内居住。随后，中央党校抽调王亚文、李逵六、马其静、郑伊倩等同志协助成仿吾工作，组成了成仿吾校译小组，重新校译《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1977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成仿吾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常委，参加党校的领导工作。校译马列著作，组织学员座谈，到各地调研访问……从1974年到1984年去世，成仿吾一直为党校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从瑞金到延安，再到北京，成仿吾一直从事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长期致力于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并且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伟大的红色教育家”。

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多的陈景润

□月 明

中国科协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厦门大学以陈景润为原型，创作了话剧《哥德巴赫猜想》并演出，一时间重又勾起人们对陈景润的怀念和对陈景润现象的思考。

陈景润当年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成为学生们的偶像，以至于1978年之后的那几年高考，数学系成为报考第一热门。从哥德巴赫猜想所代表的人类智慧的高度讲，陈景润无疑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这样的科学家的出现越多越好。但是，无论对大师级科学家多么急切，投入多么多，想复制出众多的“陈景润”，是不可能的。

人类前后的历史可能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但特定的时代不可能重复，历史人物也绝不可能重现，更不可能批量生产。陈景润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物，他的研究成果是个人努力加上各种机缘的产物。现在不可能再出现陈景润那样的时代和具有陈景润一样经历的科学家。

有人说，陈景润最杰出的科学成果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产生的，是不是可以不应该给科学家、学者这么好的待遇，不要供养得那么好，就会逼出杰出人才呢？先不管这符不符合制度和法律，古今中外，无论逆境顺境，都产生过杰出的文明成果和杰出的人才。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记载。抗日战争时期，那么艰难，大学校舍是茅草屋，竟然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各学科学者。逆境确实可以激发人的潜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但顺境一样可以出人才出成果，甚至出更多。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康熙字典》，都是在太平之世由皇帝亲自主持编纂的好书。美国科学家的研究条件很好，生活待遇很高，科学成果也是非常多，摘得诺贝尔奖的也是美国人最多。改革开放前的一二十年如果没有那么多暴风骤雨，杰出人才可能会多很多。

所以，绝不要为了出陈景润那样的人才，试图回到陈景润经历的那个时代。这就像我们提到最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培养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却绝不可以回到那个时代的道理一样。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外伤内痛，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透过陈景润的人生，可以窥见现代中国的一段历史。他的经历证明，和平安定、建设发展，对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众生，对一个民族是多么的珍贵！陈景润在他的研究成果被认可、社会环境改善之前的人生遭遇，令人深痛，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发生了。正是因为陈景润遭受到的伤害，长期的精神压抑和营养不良，过早过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至于当科学的春天来了之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却再没有做出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那样伟大的成果。

如果要说复制，复制的、发扬的，应该是陈景润在科学上不懈探索的精神，在人生上与人为善、淡泊名利的态度。

我们现在对科学不可谓不尊重，对人才不可谓不爱惜，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不可谓不好，投入的钱不能说不多。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却是，我们所知道的当代科学与文化大师，大多是在我们国家最危难、条件最艰苦的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两代人。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得有一定周期，可是从那以后至今，好几十年了，好几代人了，杰出人才与研究人员基数、人口基数的比例远比不上那个时期。像昔日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成就，像陈景润那样杰出的科学家并没有期待中的那么多，那么杰出。人们至今还难以给“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一个完满的答案。

这其中原因有很多。缺乏科学精神，缺乏志气和毅力，恐怕是重要原因；另外，做科研搞创造，更多不是出自兴趣而是受功利驱使并被驱使得很厉害，急功近利，浮躁得很。就拿文科来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精耕细做出一两本但却可以流传下来的精品著作，而宁愿短期内出它个十本八本比较一般的书来，拿到教授头衔；再有，我们的评价方向和机制是不是还有不够公允、不够科学的地方；还有，随着信息的碎片化，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有碎片化的危险，对机器的依赖也在加深。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短期内怎么能出得了精品和杰出人才呢？

随 笔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周文琪

1991年，苏联共产党这个具有93年历史，拥有1500万党员的大党、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她不仅结束了自己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历史，同时也丧失了自身的生命。随同它一起葬送的，还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全世界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深思的政治事件之一。苏联的解体似乎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但导致其瓦解的许多因素，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上个世纪初两个著名的法国作家当年对苏联的观察。

以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闻名于世的罗曼·罗兰，于1935年6、7月间，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多月。他在访苏期间及之后，完成了《莫斯科日记》一书。但他却宣布：“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本日记”。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不少人的猜测，从而使他的访苏日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44年2月，罗曼·罗兰逝世，1995年《莫斯科日记》在中国出版。他在日记中一方面表示“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另一方面他写道：“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而进行艰苦的斗争。”那里“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他进一步写道：“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烦恼就不由自主地积聚起来”。

法国的另外一位著名作家纪德和一行人，1936年6月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访苏，纪德把自己的日记定名为《从苏联归来》，并于1937年公开发表。他在书中坦率地把对苏联的现实考察和长远思考说了出来。他写道：“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每日工资为5卢布或更少；而对某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则享受更多的优惠。”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出现了贵族。

历史的一步步发展，完全证实了纪德的远见。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招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够吃饱肚子。这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后来慢慢变了，列宁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逐渐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半个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些特供商店。在这里国外名贵的以及苏联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这样的商店仅在莫斯科就有一百多处。

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特别是其后期逐步形成的。在此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其父辈们的一句话就能轻易进入最有名的大学，毕业后便能找到最好的工作，从而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地位。特权甚至可以成为畅通无阻搞腐败的护身符。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十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上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竟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一态势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腐败是毒害执政党生命的毒瘤。苏联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严酷事实警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我国封建社会时间长，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土壤。现在，在我们一些干部中，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腐朽特权思想还有不小市场，明里暗里谋求特权和私利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它极大地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极为重视党的建设问题，紧紧抓住反腐倡廉与反对特权不放，他还对特权现象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性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强调所有共产党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他特别指出，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一定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工作开局的重要切入点，制定实施八项规定、部署开展党的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头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督促检查，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转变、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恪守内心的独立与良知

□蔡建军

明朝历史上的重臣杨溥，不仅虚怀若谷，清气若兰，而且清正无私，知人善任。英宗皇帝称其为“朝廷的贤臣，荆楚的英才”。

明人耿定向在《先进遗风》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文定公杨溥为相时，他儿子一次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往京都探望他。杨溥问道：“你这次来京，沿途接触的地方官不少，到底是谁好谁坏？”儿子似乎余怨未消：“好的数不尽，只是江陵令范理太糟了。”父问：“何以这样说呢？”儿子答：“别的地方都是酒肉招待，赠以金银；只是江陵令范理最坏，两者皆无。不看僧面看佛面，这分明是不把你放在眼里。要不，怎能这样对待我？”

听到此，杨溥不但没有不高兴，而是眼睛一亮，心想，范理能够这样驳他“面子”，公事公办，说明他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必有能耐，非但不怒，反而连连称赞他是位好官。

杨溥记下江陵令范理的名字，暗派人到江陵考察，调查结果正如杨溥所料，范理为官清正，名望很高，堪称“江南第一清官”。于是，他上疏皇上，提拔范理为德安知府。

为官之人肩负着选人用人之责，首先应当学会慧眼识人。既要不降格以求，又不要求全责备，用独立、全面、辩证、客观的眼光考察识别人才。“识人”不能停留在感觉和感情上，更不能划圈子选人，而要公道正派用人。

鲁哀公问孔子：“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说：“把正直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恶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了；把邪恶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人之上，百姓就不服从。”

范理不负众望，在任甚有惠政。几年后，杨溥又提拔他出任贵州左布政使，此时，范理的幕僚说：杨溥大人对你这么器重，一提再提，你从未答谢过，起码也要写一封信，表示感谢才近乎人情。范理却说：“宰相要为朝廷用人，我为朝廷出力，皆是为公办事，并非私人之交。有道是公不谢私。如若重礼答谢，岂不亵渎了宰相的厚爱之心？”

无独有偶。城阳郡太守梁柳，是东汉学者皇甫谧堂姑母的儿子，两个人住在一个村子，时常会互相走动。皇甫谧虽书读得好，但家境并不富裕，每次梁柳来家里吃饭时，皇甫谧只用简单的饭菜来招待他。几年以后，梁柳因文章写得好，被朝廷看中，当上了城阳太守，许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攀附的好机会，纷纷送上贺礼，或是摆上几桌，以示庆贺。有人就劝皇甫谧也买些酒肉，为梁柳饯行，加深一下感情，将来没准能提携一下，使生活得到改善。可皇甫谧却说：“梁柳是平民百姓时到我这里来，我送他迎他不出家门，吃饭也不过是简单的饭菜。现在，他当了城阳太守，我就用酒肉来招待他，这不是看重城阳太守的职务而看轻了梁柳本人吗？那样一来，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以后让我怎么做人？”

皇甫谧这番话让事后知道此事的梁柳受到了很大震撼，他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对皇甫谧的为人更加敬重。在人际交往频繁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都喜欢攀高枝、傍大款，喜欢依傍别人，结交显贵，但范理和皇甫谧却为世人带来侠义新风。他们非常自尊，爱惜自己的名声，对他人不依不傍，坚守着内心的独立。自尊，不仅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品质。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摘自江苏省委党校《唯实》）

党校文摘


江西省委党校“实事求是”照壁

校园风光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